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 之权力机制

The Power Mechanisms of the Tibetan-inhabited
Area of Xunhuat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 杨红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 之权力机制

Qingchao Xunhuating Zangzu Jujuqu zhi Quanli Jizhi

○ 杨红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 / 杨红伟著.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04-038938-8

I. ①清… II. ①杨… III. ①藏族 - 民族政策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①D69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893号

策划编辑 梁宝贵
责任校对 孟 玲

责任编辑 梁宝贵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封面设计 张 志

版式设计 王 莹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60 千字
插 页 2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m.com>
<http://www.landracom.cn>

版 次 2015 年3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3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938-00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and 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

的发展机遇。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锐意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思想库作用，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社会事业，是一种繁重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精品源于艰辛，质量在于创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态度，离不开辛勤的劳动，离不开创新。树立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学风，是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营造有利于学者潜心学问、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为此，自 2006 年始，教育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计划，旨在鼓励高校教师潜心学术，厚积薄发，勇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欣然为后期资助项目题字“厚积薄发”，并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亦为此题字“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此举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以优异成绩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序 一

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并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生活方式往往积淀为一种地方文化。环境不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就不同，于是形成各具特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地方性知识体系反映在经济上，就会有生产模式与家计制度的多样化；反映在文化上，则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因地制宜；反映在社会上，不免就出现了社会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差别。凡此种种，就产生了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区域社会，等等。有关区域的概念，虽然在不同的学科中，区域的地域范围有别，考察的尺度不同，区域也有大小之分，但总的来说，均体现了空间上的差异性。中国幅员辽阔，环境复杂，族群众多，信仰各异，区域性表现得尤为显著。因而在历史学中，区域研究不但体现为一种史学观念，也构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章开沅先生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大国，如果不认真通盘规划、分工合作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就很难为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①他强调的正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相连，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接，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族群活动的疆场与迁移的走廊。至清代初期，这里已经形成了汉、回、藏、土、蒙古、东乡、撒拉、保安、裕固等众多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格局。如果单纯从自然条件与生产水平上考虑，清代甘青不仅在政治上近乎于一个整体，在经济上也可视为

^① 章开沅：《“南通模式”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页。

一个区域。然而言及文化与社会，就不能忽视宗教信仰与社会组织的差异，族群间与宗教间的差异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同一宗教之内，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与分歧，如伊斯兰教内部存在老教与新教之争，藏传佛教格鲁派内部存在不同寺院集团之争。因而，在甘青藏族聚居区社会的研究中实有必要缩小区域尺度，将研究对象放到一定范围内加以放大观察，进行具体而微观的分析。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深入这些族群区域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把握其社会特点，了解其宗教、社会冲突的本质。正因如此，杨红伟所著《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一书，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自 2004 年受聘为兰州大学“萃英讲席教授”，除为研究生系统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课程外，连续几年在红伟陪同下奔赴藏族聚居区考察调研。一路上所见景观，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清真寺唤醒塔顶的银光闪烁与藏传佛教寺院佛殿的金光璀璨，深感宗教在西北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浓厚气氛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当时，红伟正致力于近代西北社会经济史与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研究，并有若干篇论文发表，于是，我们就宗教对西北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进行了讨论。不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路上的闲聊竟然导致他研究方向的转变。他还提出，西北地区族群社会与宗教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只有在对各族群的族性与宗教性有所把握的前提下才能对其经济活动予以合理的解释。我当时就表示认同，并从他的谈话中深受启发，希望他以此作为自己近期研究的选题和深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前奏。

红伟本科时期就读的兰州大学历史系，承继了顾颉刚、张舜徽、史念海、赵俪生等老一辈史学家的优良治学与育人传统，教风严谨，学风甚浓。他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史学训练，又曾在王劲教授、王希隆教授的指导下先后攻读历史学硕士和民族学博士学位，因而能够真正将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探讨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他选取清代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作为个案，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发现了既有研究部落社会制度与政教合一制度分析的不足，提出区域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概念，从而将社会网络中的各种权力看做是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2006 年章开沅先生至兰州大学讲学时，曾对红伟的这一研究思路给予热情赞赏，并结合一些国外史学研究的案例，谈了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与方向。

红伟广泛涉猎相关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权力理论，较为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罗素、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吉登斯、哈耶克等人的经典理论著作，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凝练出包括知识→资源→权力→符号→权威→秩序诸层次递进的分析逻辑，保证了全书的科学性与内在一致性。他又旁及宗教学、藏学、神话学的相关理论

与方法，坚持以地方性知识理解区域社会，以宗教教义理解宗教社会现象，以族性解释族群社会行动，以现场感解释宗教仪式，从而使其研究既忠于历史真实，又能从新颖的视角提出新颖的见解。他认为清代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部落权力、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三种基本权力形成的特殊权力运作机制，在区域社会的知识体系与社会秩序之间起着纽带作用。三种权力以得到价值确认的资源为基础，并以知识特别是符号资本的制造作为竞争手段，以争夺在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三种权力知识的社会化程度差异，特别是其与地方性知识的相容与改造能力，决定了藏传佛教的宗教权力在区域社会中的优势地位、部落权力的基础地位和国家权力的尴尬地位。这一理论分析过程，通过历史事件的动态展示，细细品来，令人耳目一新。

具备多学科的学习与扎实的史料，可以说是本书诸多特色的来源。通读下来，可发现本书直接引用之参考文献，即包括书籍 250 种、论文 70 篇、档案 177 卷之多。此外，据我所知，红伟为写作本书，仅青海省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循化厅档案，即以半年多的时间手抄 40 余万字；前后 10 余次至甘肃省夏河县、合作市、玛曲县，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同仁县、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我们有好几次通电话，他不是藏族聚居区寺庙访问活佛，就是在深入藏族聚居区的途中，其用心之苦和用力之勤于此可见一斑！

言及于此，我当年在藏族聚居区与红伟切磋讨论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如昨日。我深感他的史学功底好、领悟能力强，思维敏捷，前途可期，期望并相信他能在对藏族聚居区族性与宗教性深入把握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早日写出一部能够体现藏族聚居区族群与宗教文化特点的经济史来。

是为序。

彭南生

2012 年 6 月 10 日于武昌桂子山

序 二

众所周知，历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资料法。但随着从正史、考古、方志到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资料缺乏就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瓶颈。于是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从寻找资料入手，开辟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杨红伟博士就是这样一位应用新资料研究循化厅藏族聚居区权力结构对社会秩序影响的作者。

他的力作《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一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即一方面立足于历史文献，通过对大量档案资料的梳理，分析具体案例；另一方面从事田野调查，把握地方性知识体系与符号系统的象征意义，并将之与历史文献分析相互印证与补充。在此基础上坚持以历史解释历史，以地方性解释社会特性，以历史内涵充实理论分析，从而确保得出的理论模型与历史真实相符而又超越于地方社会的局限。仅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本书克服了以往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研究中单纯依靠史料重现“历史场景”的考证性研究，不仅给予历史场景更好的重建，也给予了历史现象更为合理的解释。

正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本书视角与结论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从视角来说，本书作者聚焦于甘肃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三种基本权力——部落权力、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基础、类型及其互动关系。从三种权力关系入手解读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社会，不仅符合中国清代以来西北阶层社会的实际运行状况，而且有利于从权力与关系构成的网络中梳理影响这一社会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排序。

从结论来看，本书作者有三点创新：

第一,三种基本权力之间存在如下关系:以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权力构成了整个权力机制的基础,其他两种权力只有通过这一权力才能在循化厅藏族聚居区发挥作用。以宗教资源为基础的寺院权力在该区域内上升为魅力型权威,虽然在总体上须仰仗清廷而取得相应的合法性,并屈从于地方政府的强制力,但在面对地方行政系统处理区域内事务时却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是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的基本力量。否则,地方行政系统所具有的政治权力,就很难真正发挥相应的效力,从而产生另外一种政府失效,即行政体系所依据的汉族儒家文化的范畴与循化厅藏族聚居区地方性知识之间的文化张力导致的社会价值规范的异质性。

第二,在具体的区域社会研究中,通过深入分析权力概念的结构性关系,厘定了决定区域社会权力结构的知识体系与符号系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将区域社会秩序的解释奠定在了更为广阔和坚实的基础之上。

第三,在社会变迁方面,本书作者提出社会秩序的变动以知识体系和符号系统的发展路径为依归,也存在演进与建构两个方面,从而为当下解决国家权力在民族地方社会的合法性认同与行动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希望本书所写的循化厅藏族聚居区权力机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能对完善今天西北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

是为序。

徐黎丽

2011年12月20日于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目 录

第1章 范围与方法.....	1
第1节 导论与计划.....	1
第2节 分析技术	14
第3节 技术线路与结构安排	32
第2章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社会与历史.....	47
第1节 族群构成及其流变	47
第2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经济生活	60
第3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宗教信仰	72
第3章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权力类型	87
第1节 部落权力的资源基础与部落制度.....	87
第2节 宗教权力的资源基础与寺院制度.....	102
第3节 国家权力的资源基础与统治结构.....	118

第4章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权力与资源交换	135
第1节 部落权力与资源交换	135
第2节 宗教权力与资源交换	146
第3节 国家权力与资源交换	164
第5章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权力机制	181
第1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宗教权力的格局	181
第2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寺院核心大联盟的角力	193
第3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权力机制	203
第6章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知识与秩序	217
第1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权力与知识	218
第2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符号资本与权力	233
第3节 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知识差异与秩序失范	244
第7章 演进、建构与社会秩序	255
第1节 知识类型与社会秩序	256
第2节 两种外力介入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手段与外在制度	259
第3节 以好社会的标准检讨各种制度与社会秩序	261
第4节 国家介入族群区域社会应注意的原则	270
第5节 在国家与族群区域社会的互动中建构和谐社会秩序	275
参考文献	279
重要人名索引	305
后记	307

第1章 范围与方法

第1节 导论与计划

一、本书的计划

权力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与基本社会秩序相关的那些权力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决定社会秩序根本特点的那些权力的结构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因而本书要讨论的是三种权力——部落权力、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及其结构性互动关系。对三种权力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它们各自存在的基础和自我展示的类型与功能，以挖掘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和决定在特定时空中的甘肃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社会秩序，从而在地方性知识、国家政治权力知识的互动中探索知识与秩序的关系。

当我们说到“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样一个普遍真理的时候，已经将人类对社会秩序的需求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人在面对客观自然世界时的不自足性，迫使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有进入到社会中的欲求与冲动，希望在团体的生活中规避来自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然而社会并不是自主、自动形成的——不管来自人性“善”或是来自人性“恶”的命题，都不能否认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从物质层面上瓦解群体团结的内在可能性。因而，对安全和意义的渴求，一直是人类持续不断追求的目标，这就是社会秩序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和意义所在。正如莱斯利·里普森所言：“人类希求的不仅是人身安全，为了与同类进行普通的日常交往，他们需要一种建



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此外，人们还学到了与物品的关系。通过劳动积累他们当做财产保存的所得物。自此，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职能被扩大到要围绕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建立的一种安全体制，对此最恰当的描述莫过于‘秩序’一词。”^①可见，社会秩序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结果，也是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可期望利益得以实现的途径。社会秩序对于社会的规定性，被人们表达为：“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②甚至还有人将社会秩序上升到社会的本质意义之上：“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是因为其有着自身的秩序即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社会乃是因其秩序而构成，没有社会秩序就没有社会，所以，社会秩序乃是社会的基础、根据和本质。社会的实质就是按照某种秩序组织起来并按照这种秩序运行的组织系统。”^③

所谓社会秩序，简言之，即“社会得以聚结在一起的方式”^④。人们认为在日常的意义上，“秩序”包含三重含义：（1）秩序指对立面之间或多样性之间的起码统一，即事物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或多个方面之间的张力平衡；（2）秩序指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并达到生命有机体的层次；（3）秩序指事物及其要素之间的和谐状态。^⑤对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仅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共同体内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和生活的必要前提。因而和谐的社会秩序一直是人类基于人性的美好期望。

尽管人们渴望和谐的社会秩序，然而即使坏的秩序也绝不会自我呈现、自我实现。这是一个持续困扰着中外仁人志士的社会迷思。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自从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一直是社会科学众多命题的核心之一。随着现代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强和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对这个古老话题的反刍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味、最为重要的一项智力发展”^⑥。

社会秩序是如何生成的，在学术界存在严重分歧，分别形成了基于建构论和演进论的秩序生成二元对立式理解。它们分别基于两种认识论的传统：唯理主义的传统和经验

① [美]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② [美] 丹尼尔·W.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郭宇峰、汪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③ 高懿德、牛磊：《论社会秩序问题与社会哲学的主题》，《学术论坛》2003年第4期，第4页。

④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林恒增、孙哲、侯力强、张同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⑤ 邹吉忠：《论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第34页；秦扬、邹吉忠：《试论社会秩序的本质及其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7期，第153页。

⑥ [美]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王胜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主义的进化论传统。来自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传统立基于每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和个
人生而具有智识与善的假设,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个人理性,个人足以
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所有细节。对此,哈耶克
称之为“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①。因而在哈耶克看来,“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主张理性的限
度,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对理性的滥用,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
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②。两种知识传统反映在社会观念中,分别形成了社
会秩序的唯理主义的建构论和进化主义的演进论。哈耶克对二者做了区分:“唯理主义传
统假定,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而
进化论者则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
是经验的总和,其中的一部分为代代相传下来的明确知识,但更大的一部分则是体现在
那些被证明为较优越的制度和工具中的经验;关于这些制度的重要意义,我们也许可以
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亦不会妨碍这些制度有
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③他还进一步指出:“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
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从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
的。”^④亦即,秩序并不只是遵从理性的结果,更主要的是在本能和道德的时间演进中自生
自发的。

正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演进的秩序和建构的秩序本身不是对立的,不是在社会秩
序的人为性和自发性之间必须作出舍一取一的抉择。二者是分别对不同社会秩序生成机
制的阐述”^⑤。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哈耶克的根本出发点就明白了。在哈耶克建构自生自
发社会秩序的理论中,他强调的是社会秩序的演进性和分层性,目的是为了反对建构主
义框架下权力的集中对个人自由的侵害。换言之,通过对建构主义的否定,以便使行动
主体在自生自发秩序下获得充分的决策和行动自由,并通过权力主体的分散化和相互制
约来实现。归根结底,对社会秩序的讨论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权力。毕竟秩序
不仅可以使公众过上有秩序的生活,更主要的是它能对那些违反它的人实施强制性制裁——
前者涉及对规则意义的认同,而后者则涉及强制——均需要权力运行其间,并作为实现

① [英] F.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② 邓正来:《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页。

③ [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8页。

④ [英] F.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⑤ 高献忠、何明升:《社会秩序的生成:从分立到耦合》,《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62页。



的保证。

事实上,无论在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中,人们怎样试图回避“权力”一词,它都始终处于在场状态。所以,无论是演进主义者或是建构主义者最终还是要回到对权力的探讨上,不得不撕开这层面纱。演进论者迈克尔·曼干脆撇开了“社会秩序”一词,直言:“社会是由多重重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①吉登斯则将权力置于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地位。吉登斯认为社会秩序是由有认识能力的行动者历时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②而行动者在吉登斯看来,就是具有实施某种权力的能力的个体;一旦丧失了实施某种权力的能力,也就不再成其为行动者。^③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权力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前一个环节,它不仅赋予秩序以意义,而且是构成秩序的基础和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

如果接受上述假定,那么当我们承认社会秩序是横向分化的多元秩序和纵向分层的等级秩序的有机统一时,亦即承认了社会权力的多元性。当然,这里以接受社会秩序的多重类型学划分为依据。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存在多种或多层级的权力主体——尽管有一种理论倾向认为,在某种类型的社会中只存在一个或一种权力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力量,迫使其他的权力服从于自己,起到足够的影响力以致决定或改变价值系统的性质与发展方向,产生单极社会秩序,但它只能存在于理想的类型中。在现实社会世界中,存在着互动的复杂权力群簇,在它们的决定下,往往是几种并非对立也绝非平等的价值要素通过交互作用而整合为有机的社会秩序。

现在让我们结束对权力与社会秩序关系的一般性讨论,再回到本书的研究计划上来,我所要展示的内容似乎已经不言自明——基于权力机制的探讨,揭示在权力群簇交互作用下甘肃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社会秩序的存在状态,具体探讨部落权力、宗教权力和国家权力各自的意义与价值系统如何建构地方性社会秩序以及它们共同作用耦合的结果,并在对权力与秩序关系检讨的基础上,试图说明实现地方社会建构和谐社会秩序的权力模型及其可实现的途径。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必须解决以下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 (1) 三种权力展开的区域,或者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进行时空结构的定位;
- (2) 三种权力存在的类型,即要厘定它们各自所依据的资源基础、知识体系或者价值系统;
- (3) 每一种权力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诉求在社会秩序生成或建构上的反应;
- (4) 三种权

① [英]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② [英] 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③ [英]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6页。

力在同一场域中的多重关系，亦即在与合作、竞争的相互博弈中所决定的社会秩序；（5）三种权力在交互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展示权力的方式以及权力升华为权威的可能性，它们如何决定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的社会秩序；（6）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三种权力主体各自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即应该具有的角色与功能转变。

二、研究的范围

在黄河首曲的北侧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大山，这就是横亘于甘肃与青海交界地带的西倾山。山顶白雪皑皑、山麓苍翠的西倾山孕育了多条黄河支流。其中泽曲、隆务河、大夏河与洮河分别朝西南、北、西北与东四个方向奔流，它们与黄河首曲一起形成了五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单元。然而崇山峻岭并未成为“社会剧场”的阻隔：山相连，水同源，文化同根，泽曲上游、隆务河流域、大夏河上游、洮河上游与黄河首曲的人们在互动中演绎了一场场生动精彩的历史活剧。本书将循化厅藏族聚居区置于王朝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把握，通过对以权力机制为核心的区域社会历史基本过程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特定区域社会发生的互动关系，作出地域化的理解和历史性的解释。

任何一个区域社会的历史，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展开的，换言之，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区域社会，应该是一个具有明确时空特征的结构。因而，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至为关键的是怎样确定“域”与“界”的问题，也就是区域怎么去划分的问题。关于怎样划分区域，经济学上以同质性与功能互补性作为标准，文化人类学中也有文化圈理论，等等。在中国区域社会的研究中，施坚雅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直接逾越的人物。施坚雅对中国区域社会的研究统称为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①。在集市体系理论中，施坚雅借助中心地理论，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三个向上递进的等级结构。在这种体系中，基层市场社区构成了农民们日常生活的范围，日常频繁的交流以及与基层市场社区之外隔绝的状态，会使基层社区内部出现文化的同质化以及与外界文化的差异化，呈现出亚文化群体的特性——“一旦基层市场社区达到了包容农民生活的程度，它也就造就了后者的生活方式”^②。基层市场之上是中间市场，再往上就是中心市场，分别形成了

① 任放：《施坚雅模式的学术效应》，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8页。

②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